

要呼吸？還是面子？： 在新冠肺炎的時代重讀麻風*

To Breathe? Or to Save Face?:

Rereading Leprosy in the COVID-19 Era

董顯亮**

Xian-Liang DONG

梁其姿於2009年出版的*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一書曾引發中西方學術界的熱議。¹雖然底層大眾的患病經歷，以及與之而來的生命體驗是作者一直關注的重點，但囿於當時材料的限制，梁著在此課題上的挖掘仍有局限（Leung 2009）。因此，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與萊恩（Grace Ryan）在肯定該書對補充全球歷史面貌的貢獻後，又基於人類學視角，呼籲更多學者能對中國近代以來的麻風病患進行個體式研究（Kleinman and Ryan 2010）。

既是呼應，又自成脈絡，劉紹華（2013）對麻風的關注始自2003年四川涼山田野調查期間，而她有關涼山諾蘇流動青年的研究，已經顯示出國家治理、汙名歧視與邊緣族群的互動是其研究關懷之所在。2018年出版的《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一書的特別之處在於，劉紹華並非從病人出發，而是選擇書寫了另一個被歷史遺忘的群體——麻風醫生，因為她認為在麻風汙名的影響下，疾病患者的社會空間移動，以及個體的

投稿日期：2020年3月3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6月22日。

* 「面子」是劉紹華常常提及的概念，本文標題藉此做一呼應。本文的撰寫尤其要感謝相隔三地的臺大醫療史四人讀書小組，還有跨越洲際、學科的Corona讀書小組的討論。疫病帶來了創傷，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知識生產方式。

**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

電子信箱：xianldong2-c@my.cityu.edu.hk; yan.xianliang.dong@gmail.com。

1 中文版：朱慧穎譯。2013。《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北京：商務。

能動性等方面都受到限制；然而，麻風醫師卻極為不同，他們是個人生命、麻風防疫、國家政治三個歷史面向的「主要行動者」（劉紹華2018: 33）。對劉著內容之回顧已見諸於多篇書評，筆者試圖在此提供進一步討論的話題。

爲了強調中國在二戰後的特殊歷史情境，劉紹華創建了「後帝國」這一概念來代替「後殖民」。此處，「後」不僅僅標識了時間線索，更代表了作者所試圖揭示共和國論述中的矛盾，並將其拆解的歷史書寫態度，而這些矛盾在過去常被掩蓋在社會主義制度與意識形態話語之下。「後帝國」的另一核心則涉及「帝國」的陰影及其顯形，在以麻風防疫爲中心的「後帝國實驗」下，歷史論述的矛盾愈發明顯，焦點在於1949年後的社會主義中國並未如自我標榜的那樣，與「帝國」和「殖民」決然分裂；反而是承襲了教會與帝國醫療的建制與師資，繼而在蘇聯、全球模式的更迭中，不斷塑造著自己的「新帝國」話語。尤其是在醫學制度、機構、教育和技術等層面經歷的一系列「改良」與「創新」上，麻風防疫不斷向基層擴張，專業知識不斷簡化整合爲易於上手的實操。國家、醫生以及社會都宣稱服膺於科學的旗幟，但實際上政治目的遠高於科學理性，最終服從於形式主義教條；而對於麻風防疫來說，則極端顯現在動機與手段相悖的「強制人道主義」（coercive humanitarianism）之運作。在此過程中，疾病的汙名沒有消失，反倒是配合社會主義式的階級論述，將麻風醫生和病人一同推向更加邊緣的位置。劉著致力於構建「後帝國」之概念，相照下，似乎有意迴避了有關「現代性」的陳腔濫調。但既然討論到歷史的斷裂與延續，「現代」也不失爲另一可以加之細化的議題。如劉著曾提及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對「四個現代化」的強調（ibid.: 424），但這個目標早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已提出，同樣是強調「科學技術現代化」，那麼，在國家戰略的「大帽子」下，醫師在不同時期是如何理解「現代」的含義，又是怎樣將其踐行的呢？

回到上文提及的「形式主義」，當今中國大陸公共衛生系統之運作是否仍然深陷於該教條中？如果我們以症候式閱讀來對照劉紹華的著作，答案應當是肯定的，而這也就解釋了在2020年中國率先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之際，為什麼該書以及作者對民族主義的批判會引發如此之大的共鳴，²不僅僅是報紙或新媒體，筆者參加的自發式網路讀書小組也將劉著納入討論。但隨之而來的疑問便是，我們為什麼要在一個急性傳染病爆發的時刻，重讀一部解析有關「共產主義幻覺」³的著作；又為什麼關注一種可能遠離大眾視線的慢性傳染病呢？職是之故，當筆者重讀劉著，寫作本文時，不自覺也不得不對當下的疫情作出對讀，以期從中找到可提供思考之啟明。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後帝國」一詞時，劉往往聯結「實驗」、「政治」、「論述」、「隱喻」、「意識形態」等詞構成複合概念，而此舉使「後帝國」的涵義與作用變得混雜，但也同時說明「後帝國」的性質只有在「話語」和「實作」，以及二者互相作用的情境下纔能得以彰顯。從此看來，「後帝國」更像是一個寄生性概念，它不僅要倚靠宿主（話語或實作）纔能存活，也能從一個宿主（一種疾病、一種話語或實作）過繼至另一個，同時也獲得了更加頑強的「生命力」。讀者雖然對麻風感到陌生，但不難想像它所象徵的慢性疾病本身已經隱喻了中國的現狀：一旦遭遇緊急狀況，無論是災難抑或疫病，持續存在的社會慢性病／矛盾，連同堆積在國家、政府所把持的公共行政與服務中的沉疴，瞬間傾瀉而出，在短時間內，中國式集體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話語愈是想將其遮蓋，它身上的帝國病癥卻越是引人注目。

與此同時，歷史還證明寄生物與宿主之間總是會達到某種平衡狀況，而皆可存活，一旦社群中大都對某種當初來勢洶洶的疾病產生免疫力後，它所帶來的結果則是自身演化為地方風土病或社群的幼年疾病（McNeill 1998）。一波又一波疫潮是否能引發歷史變革？當有關記載盡付闕如，劉著卻不斷提醒道，不只要關照救疾之舉，社會更應當不斷反省歷史再現的政治與公衛防疫的倫理（劉紹華2018: 459）。她在近期的訪問中說，如果無法正視歷史，那麼醫療衛生與公共危機中的汙名與不平等問題將不會得

2 還可以參考劉紹華（2014）之前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

3 「共產主義」不等同於「後帝國」，筆者認為共產主義是後帝國自己的想像之一，即站在與中華民國和資本主義決然對立的位置。筆者正要說的是，現在的中國民眾仍然抱有此種想像，或是說中國政府在營造這種幻覺。

到徹底解決。但我們真的缺失歷史嗎？正視歷史不止限於是與否，而且還在於誰能書寫？怎樣書寫？劉著曾提到，如果在中國大陸要編輯學科歷史，必須得到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許可，而在其著作出版時還未完成的《中國麻風學學科史》也在2018年面世了。⁴麻風的歷史並非無人書寫，但是在官修史書的立場下，讀者在其中既找不出劉著盡力保留的「雜聲」，也不可能看到麻風防疫網絡中的競合關係，有的只是「自古以來」的成就，甚至是刻意創造的一種「正確的集體記憶」。相當諷刺的是，當網路上如此之多的「武漢疫區日記」、「疫區的聲音」，甚至是歷史學者關於「具體個人」的訪談，皆被媒體平台下架、消聲、封鎖；另一邊廂，中國政府所宣傳的意識形態卻以各種形態頻頻出現，⁵而題為中華民族認同、馬克思主義信仰、中國特色醫療衛生制度的論文也接踵而至。筆者並非要評判以上記載孰是孰非，而是希望反身思考，在發表評論之前，我們是否已經坦承了自己的身分、立場和位階？而那些被隱藏的又應當如何被揭示？

個人的聲音可以成為銘證，還可以當作是布散謠言，同樣也能製造隱喻。劉紹華認為麻風是一個被高度汙名化的疾病，歷史最多記載應對之道，而缺少具體的人物事跡，更無從知曉他們的情緒如何。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語境下，醫生被指派去治療麻風病人，他們不單是在治療病症，還肩負著解放底層民衆的任務。但這究竟是出於個人的道德關懷，還是迫於國家的模範標準？其中政治和醫療環境下的矛盾滋味，就流露在麻風醫生所從事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中，而劉著最為突出的貢獻也在於，將麻風醫生充滿張力的情緒記憶以口述歷史的形式記錄下來。但需要稍加辨別的是，除了事實的陳述之外，醫生的回憶應當被後來的研究者處理為對自我情緒勞動之角色的反應，而非舊時情緒的完全再現。研究者當然可以繼續解讀劉著所蒐集、呈現的原始材料，但同時也需要注意材料自身體現的歷史結構，以及它過濾與篩選的經過。因此，當我們懷著共情的心態與

4 由中國麻風防治協會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5 《大國戰「疫」——2020中國阻擊新冠肺炎疫情進行中》本來計劃由五洲傳播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後因「低級紅」和「捧殺」等爭論而停止，但中國官方媒體卻在後來推出一系列「習近平戰『疫』兵法」的文章。

理解的眼光去認識麻風醫生之同時，是否也需要提問：中國的知識分子、科學專家如何與國家體制共謀，且主導了民衆對於醫療與健康的知與不知？當專家成為官僚之後，他們的論述與實作，又為何在帝國的論述下操演，是否有意或無意地撼動了帝國的結構？然而，劉著所採用的口述歷史之方法還是提供了一條共情與批判相存的辨證取徑，這也構成了一種書寫的張力——利用被採訪者自己的敘述，讓他們（在訪談、在書中）重新面對龐大的政治、社會結構，重新審視他們在當時作出選擇的動機和理由。

然而遺憾的是，帝國的結構依舊頑固。麻風醫生的矛盾亦如作為底層民衆的麻風病人，被捆綁在疾病與貧困之中；疾病作為悖論式的象徵資本，卻沒有讓他們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保障下，拿回「當家作主」的權力。之於今日新冠狀病毒防疫，帝國不斷重複誇耀的是在生命政治（biopolitics）意義上人口管控的功績，極度忽視的是具有個體存在意義的生活政治（politics of life），並為此掩蓋了諸多個體不平等的事實（Fassin 2009）。

不平等的事實並非只依靠公衛政策就能產生，它同時憑藉著疾病隱喻而得以強化，且今時今日兩者之交互已不僅限於一地一國。2020年全球範圍內對新興流行病（emerging epidemics）的論述，已是一項集體性構建。劉著雖然也談及疾病隱喻的變與不變（劉紹華2018: 447），但隱喻仍像是背景音效一般，缺少對其曲調編奏的分析。可問題是，高度汙名化的疾病隱喻與話語論述的關係究竟為何？一種疾病汙名之建立是否需要持續地論述？我們默認麻風是高度汙名化的疾病，而書中所呈現的已經是作為結果的隔離場域，並非它得以建築的基礎——汙名究竟是來自疾病本身，還是宗教？是對傳染的恐懼，還是對肉體損傷的嫌惡？換個問法，是不是存在沒有情緒反應的疾病汙名？而對個體生命的輕視是否就來自情感上的麻木？就像Leprosy變成Leper了一般，使用者已經忘記了那個詞源究竟是什麼？所以，我們仍要回到疾病隱喻產生的條件和環境來審視——汙名化究竟是本地還是國際問題？麻風的汙名限於特定群體內部嗎？而對照之下，肺炎的汙名為什麼卻可以無遠弗屆？就目前的狀況來看，以「武漢肺炎」來稱呼新型冠狀病毒；以國籍來作為檢疫隔離之標準，而非細察旅遊史；

以全民派錢來取代政治、醫療改革；以犧牲一部分人來掩飾自己的過錯，這些毫無疑問都是在為疾病穿著上政治的新衣。

經歷此次肺炎疫情，我們都多少學會透過醫療疾病看到政治層面的操作。但自詡為知識分子的人們又如何看待自身在政治與醫學夾縫中的處境？現在社會、學界可能都不乏這樣一種聲音——希望任何人暫且放下對體制的批評。人命關天之際，研究人文社會的學人是否也會常常懷疑，為什麼要在當下發出「批評」，現在難道不應該集中力量拯厄扶傷嗎？如果意見不能產生「實際」效應，為何還要提出「異見」？或是等這段時間過了，我們再來反省不好嗎？更甚之，還有人會說現在「發聲」就等於「添亂」。當然，人文社會領域的學人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價值，於是我們又可以看到另一種言論，既承認公共衛生的政治性，但又要讓這個政治性持續發酵，從此生產出「緊急情況下合理的疾病隱喻（汙名）」（姑且譯作 reasonable metaphor[stigma] of disease in emergency）。這種隱喻所樹立的汙名形象被當作抵抗威權，塑造主體身分，贏取政治權力的「必要」手段，它不關乎大國的政治交易，而產生自「弱勢」（minority）的自我保護機制。終於，這個問題又要陷入以下困境，知識分子要在什麼情況下，理解「合理性」之所在？如何質疑「合理」，而不會陷入「左膠」（leftard）？怎樣在某一具體語境下，既和當地人產生情感共鳴，在理解其情感需求的基礎上，繼續說明「合理」的潛在「危險」？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劉紹華（Liu, Shao-Hua）。2013。《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Wo de liangshan xiongdi: dupin aizi yu liudong qingnian*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臺北（Taipei）：群學（Socio Publishing）。
- 。2014。〈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與挑戰〉“Zhongguo minzu zhuyi de jueqi yu tiaozhan” [The Rise and Challenge of Chinese Nationalism]，《思想》*Sixiang* [Reflexion] 27：217-232。

- 。2018。《麻瘋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
*Mafeng yisheng yu jubian zhongguo: houdiguo shiyan xia de jibing yinyu yu fangyi
lishi* [Leprosy Doctors in China's Post-Imperial Experimentations: Metaphors of a
Disease and Its Control]。臺北（Taipei）：衛城（Acropolis）。。

二、英文書目

- Fassin, Didier. 2009. "Another Politics of Life is Possibl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6(5): 44–60.
- Kleinman, A. and G. Ryan. 2010. "Betwee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Stigma, the Subaltern, and Leprosy in China: an Essay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Leprosy in China,"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34(3):548-552.
- Leung, Angela Ki Che. 2009.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cNeill, William H. 1998. *Peoples and Plagues*. New York: Anchor Books.